

杜成宪 主编



Zhongguo
Jiaoyu Wenhua
Yanjiu
Congshu

中国教育文化
研究丛书

中国传统童谣研究

——在教育世界的边缘

张梦倩 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山西教育出版社

完
主
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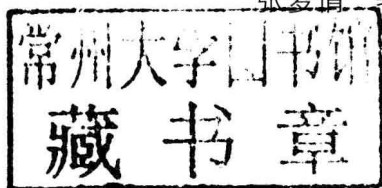
Wang
J. Wenhua
J. Wenhua
J. Wenhua

丛
书
教育文化

中国传统童谣研究

——在教育世界的边缘

张楚倩 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山西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中国传统童谣研究/张梦倩著. ——太原: 山西教育出版社, 2012. 9
(中国教育文化研究丛书/杜成宪主编)
ISBN 978-7-5440-5612-0

I. ①中… II. ①张… III. ①儿歌-诗歌研究-中国
IV. ①I20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26982 号

中国传统童谣研究——在教育世界的边缘

ZHONG GUO CHUAN TONG TONG YAO YAN JIU ZAI JIAO YU SHI JIE DE BIAN YUAN

责任编辑 郭志强
复 审 杨 文
终 审 张沛泓
装帧设计 薛 菲
印装监制 贾永胜

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教育出版社
(太原市水西门街馒头巷7号 电话: 0351-4035711 邮编: 030002)
印 装 山西新华印业有限公司
开 本 787×960 1/16
印 张 20.75
字 数 210千字
版 次 2012年9月第1版 2012年9月山西第1次印刷
印 数 1—3000册
书 号 ISBN 978-7-5440-5612-0
定 价 41.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电话: 0351-4120948

总 序

20 世纪初，适应了兴办新式学堂的需要，也深受“新史学”思潮的影响，中国教育史学科在中国诞生。教育史学科诞生之后的一段时期里，学科的价值主要体现为人才培养，即为师范学堂（学校）培养未来的教师进行专业训练。之后，出于思考和探索现实中国教育发展出路的需要，人们开始主动地反思本国的文化和教育传统，教育史学科的科学价值逐渐体现并为人们所重视。中国教育史学科诞生早期的这两个特点——教师训练的需要和思考中国教育出路的需要，深刻地影响了学科未来的发展。在很长的一段时期里，在宏观层面注重对中国历史上的教育制度和教育思想的研究和阐述，成为中国教育史学科发展的主旋律。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对上述中国教育史研究取向的第一次冲击，来自当时不同的教育史观指导下的中国教育史研究。以陈东原为代表的实证主义教育史观，将目光投向历史事实，注重实证，更关心“教育究竟是怎样发生的”之类问题，反对脱离事实的玄想和思辨；以黄炎培为代表的实用主义教育史观，依据教育与生活、学校与社会相联系的观点审视教育的历史，主张“用全社会的眼光来看教育、

讲教育”，先将教育的“大史”写成，才能去撰写教育的“小史”；以杨贤江为代表的历史唯物主义教育史观，批判以往教育历史书写中的统治阶级立场，立志以阶级斗争的线索重写教育史，并体现劳动群众的教育活动在教育史中的重要地位。这些史观在政治立场和学术旨趣上相去甚远，但共同点是试图突破反映制度化教育发展和著名教育家思想的教育史表现样式，倡导更为丰富、具体、生动、视线下移的教育史。显然，这种研究理念对固有研究模式是个突破，具有积极意义，事实上也共同促成了当时中国教育史研究的繁荣。当然，这些主张及其指导下的研究实践也存在明显的缺陷，如：泛化教育史研究对象、过分强调教育历史发展中阶级斗争的意义，等等。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教育史学科的发展面临着与半个世纪前颇为类似的情形，所不同的是，在学科建设和研究中开始普遍地强调和推行历史唯物主义。在中国教育史的教学和研究中，同样是更为关注制度化的教育和教育思想。

1958年9月，《红旗》杂志发表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的文章《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提出“中国教育史有人民性的一面”的观点，认为：劳动人民有自己的文化教育活动，如果不予表现，这样的教育史就不全面；从孔子到孙中山，历史上那些有民主性、进步性的社会思想、政治思想、哲学思想都影响到对人民的教育，中国教育史都要提到他们。于是，在当时所编著的为数不多的中国教育史著述中，劳动人民的生产教育、科技教育等内容

和屈原、司马迁、范缜、关汉卿、施耐庵、吴承恩、曹雪芹等历史人物的思想，也被写进了中国教育史。这样的做法既关注了向来受到忽视的劳动人民的教育、科技教育和非教育人物的教育历史价值，也表现出研究视角的下移有可肯定之处，但其指导思想却颇可商榷，同时也有泛化研究对象、模糊学科界限、造成思想混乱之弊端。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教育史学科的拨乱反正是从重新评价孔子的教育思想开始的，由此开始了对“文化大革命”期间甚至之前年代教育史研究中诸多教育历史人物和教育史基本理论问题的重新评价。同时，1977年恢复高考之后，全国高等师范院校教育专业的人才培养迫切需要相应的课程和教材，历史似乎又一次重演。于是我们看到，在相当长一段时期里，中国教育史研究更多地关注了学校历史、教育制度变革、教育家思想这类研究主题，学术关注的层面仍旧是“高高在上”的。然而，变化也随之发生。

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反思热”，20世纪90年代“现代化探索热”，也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教育史学科。前者，启发人们拓宽学术研究视野，去发现和开拓教育制度史和教育思想史之外的更广阔的研究领域；后者，引导人们去关注、学习乃至借鉴、运用当代西方的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理论、方法及其最新成果。于是，在世纪之交，作为对以宏观研究为特征、以制度化教育为对象的研究取向的不满，中国教育史研究中再次出现视角下移的新趋势，并在近年蔚成风气，成为学术潮流。

出现在世纪之交的中国教育史学术发展中的这一潮流，表现出

与欧美国家产生于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新社会史”潮流颇为相似的学术特点，即：从历史认识论方面看，表现出对“总体的、社会的历史”的关注，同时也十分重视对历史进行文化和心态的考察；从方法论方面看，表现出“自下向上看的历史”的价值取向，改变了历史研究的视角，普通人和底层群体、日常生活和具体过程等格外地受到关注；从方法与技术方面看，表现出对诸多其他学科研究方法的借鉴，尤其是社会学、人类学方法的借鉴。由此，极大地拓展了教育史研究的范围、丰富了教育史研究的方法、改变了教育史研究的面貌，前所未有地展现了中国教育历史发展的丰富而生动的画面。中国教育史学科诞生以来的 110 年里，学术研究关注点的三次下移，折射出的却是教育史学科发展的矛盾运动。每一次下移，都带来了学科认识的扩展和深化；每一次下移，也带来了学科发展的新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表面上看，三次下移具有相似性，而实际上，无论是从背景、原因，还是从性质、内涵和意义等方面进行考察，三次视角下移，情形各不相同，而以发生在世纪之交的这一次最可肯定。这一次的探索更多地具有学术价值，对中国教育史学科发展将会产生长远影响。

本丛书所收入的五种中国教育史著作，可以看成是世纪之交中国的中国教育史研究中“新社会史”取向的尝试，它们所关注和研究的是历史上的教育究竟是“怎么发生”的。这五种著作，分别研究了中国传统童谣、中国传统游戏、中国传统尊师风俗、中国大学教授和中国学校校训。童谣、游戏、风俗、教授、校训，这些问题

在以往的教育史研究中涉及不多，甚至有些还是研究空白。选择这些研究主题并不是出于猎奇之心，也不是好走旁门左道，而是表达了我们教育历史的理解。作一个不十分恰当的类比：如果将一部中国教育史比成一头巨大的恐龙的话，那么，以往百年里人们更多关注的教育制度和教育家教育思想的历史研究，搭建起了恐龙的骨架，而近些年来人们关注历史上教育的具体发生和实施过程的研究，则填补了恐龙的血肉，由此恐龙才可能复活。

20 世纪 90 年代，出于自己的学术兴趣和对教育史的认识，我曾经撰写过从儿童歌谣、儿童游戏和儿童题材绘画探究中国传统儿童观和教育观的论文，也曾撰写过中国历史上的城市发展与教育发展关系的论文。相比之下，现在呈现在大家面前的这五本书，比起本人当年的那些撰述，选题更加精彩了，内涵更加丰富了，认识也更加深刻了。显然，年青一代的学者正在成长起来。

我们由衷地感谢山西教育出版社的决策者支持学术出版的眼光和胸怀；由衷地感谢张荫鸿老师以她的慧眼选择了我们。这套丛书是我们的探索和尝试，新则新矣，却一定颇多不当、不周之处，如能得到方家同好赐教，将不胜欣喜和感谢！

杜成宪

于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

目 录

绪言 1

第一章 “荧惑说”与“童子之情”——千年流变中童谣 的背离与回归 10

第一节 释“童谣” 10

第二节 “荧惑说”盛行之下童谣的异化 24

第三节 明清时期童谣向儿童生活的回归 40

第二章 童谣面相观 65

第一节 童谣与政治生活 65

第二节 童谣与社会生活 78

第三节 童谣与儿童生活 112

第三章 童谣功能论 147

第一节 童谣的训练功能 148

第二节 童谣的教育功能 174

第三节 童谣的娱乐功能 218

第四章 相反相成的两个世界——童谣与蒙养教育 241

第一节 “两个世界” 的分离 242

第二节 “两个世界” 的交会 262

结语 298

参考文献 310

绪 言

一

1952年，美国温纳-格伦基金会（Wenner - Gren Foundation）组织了一次人类学家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法国结构人类学家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 - Strauss）作了简短却意味深长的发言。他说：“我们是从历史中拾破烂的人，我们在历史的垃圾箱中寻找我们的财产。”^① 列维-斯特劳斯的这番话令大部分与会的人类学家感到愤懑。而对于从事历史研究的人来说，听到这样一席话或许也会稍稍感到一阵不安吧？那些被委弃于“垃圾箱”中的所谓“破烂”是否也本该是历史学家珍视的财产呢？接下来的问题是，在“历史的垃圾箱”中到底隐藏着什么玄机？对此列维-斯特劳斯也有说明：人类学赖以生存的正是历史学家“几乎是不屑一顾的日常生活中的平凡小事”。^②

① [法] 迪迪埃·埃里蓬（Didier Eribon）著，袁文强译：《今昔纵横谈：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传》，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55页。

② [法] 迪迪埃·埃里蓬（Didier Eribon）著，袁文强译：《今昔纵横谈：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传》，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55页。

列维-斯特劳斯的这番话当是针对传统史学而言的。早在19世纪、20世纪之交，传统史学的堤坝就已遭到现代新史学潮流的冲击。德国作为西方传统史学的营垒，其内部首先树起了反叛的旗帜。自1891年始，文化史学家兰普勒希特（Lamprecht）与兰克学派展开了长达25年的大论战。兰普勒希特认为历史不应仅仅研究某些精英人物，不应束缚在政治史狭窄的框架内，而应将目光放在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应该研究人类生活的总体。^① 这场挑战虽未全然撼动传统史学深厚的根基，但却指明了新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那就是研究范围的拓宽。自此，历史学家的视野变得开阔，涉足的领域日渐扩展，开始关注普通民众和平凡生活，开始意识到之前“长时间被人看不起的，散置在编年史、时代回忆录，还有文学中的废料”^②也有着不容忽视的价值。

从教育这个角度而言，本书的研究对象当属于曾经的“历史的垃圾箱”中的“废料”。

童谣在中国的历史可谓久矣。且不论那些曾经唱响但又不幸而致如风般渺然散去的，《列子》中载《康衢童谣》传说就出于尧时，这应该是记录下来的最早的童谣。《列子》其书未必可靠，故学界也有人认为西周末年宣王（前827—前782）时童谣“檠弧箕服，实亡周国”^③才是现存最早的童谣。即便以此作计量，童谣也有了近三千年的历史。而与童谣悠久的历史相比，对童谣系统加以研究的历史显得是那么的短。一

① 参见张广智《西方史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47、283—284页。

② [法]迪迪埃·埃里蓬（Didier Eribon）著，袁文强译：《今昔纵横谈：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传》，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56页。

③ 《国语·郑语》。

直到民国以前，童谣都未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当然，历史上也不乏对童谣的议论之声，但大多是只言片语式的，且几乎全部集中于对童谣神秘隐喻意义的考量，将之视为王朝更替时“似若有凭”的“妖言”或政治斗争的工具，^① 距离儿童与教育都甚为遥远。

在传统学者的眼里，童谣是鄙俚而难登大雅之堂的，“学焉而与童子无补”。^② 这种论调甚至到了 20 世纪 20 年代依旧余音未已。1918 年北京大学发起征集近世歌谣运动，不少守旧者对此冷嘲热讽，有一位前清进士就曾这么说：“可惜蔡子民也是翰林院出身，如今真领着一般青年人胡闹起来了！放着先王的大经大法不讲，竟把孩子们胡喷出来的什么‘风来啦！雨来啦！王八背着鼓来啦’一类的东西，在国立大学中，专门研究起来了！”^③ 童谣在传统文人眼里的地位于此可见一斑。

反调尽管存在，但也正是自北大歌谣运动始，童谣才引起了学者们普遍的关注。在这之前，周作人曾写就《儿歌之研究》，于 1914 年 1 月刊于《绍兴县教育会月刊》。这是最早研究童谣的一篇文章，但在当时并未引起什么反响。歌谣运动发起后，作为歌谣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童谣也随之进入了学者们的视野。歌谣运动初兴之际，仅限于搜集选编，尚未及研究。一直到 1922 年《歌谣》周刊创刊后，研究工作才步入轨道。但如果我们仔细检阅《歌谣》周刊，就会发现绝大部分文章都是从民俗学或文学的角度切入的，且以研究笼统的歌谣的论文居多，专

① 参见杜预注《左传·僖公五年》。

② 吕得胜等：《小儿语》（外八种），岳麓书社 2003 年版，第 1 页。

③ 卫景周：《歌谣在诗中的地位》，钟敬文：《歌谣论集》，上海北新书局 1928 年版，第 185—186 页。

门研究童谣的论文甚少。而在这本来就不多的几篇文章中，以教育的视角研究童谣的更可谓寥若晨星，多数文章谈及童谣与教育的关系时都是一笔带过的。传统童谣在教育史上这种近乎失语的境遇时至今日好像也未有多大改观。

二

不论是作为民俗文化还是儿童文学，童谣都应该是儿童生活中最为亲切自然的教育资料。这种判断基于民俗文化和儿童文学功能的界定。

童谣是民俗的一种。在现代意义上的民俗学建立及发展的一百多年间，学界在确立该学科的研究对象时尽管不无分歧，但歌谣（包括童谣）却是最早且最无疑义被划归进去的一类。活跃于当代的美国民俗学家阿兰·邓迪斯认为：“民俗具有各种不同的功能，最普通的功能包括对青年的教育。”^①这里的青年当包括儿童。钟敬文主编的《民俗学概论》一书在论及民俗功能时说：“在传统与现代社会中，每个人的成长都离不开民俗文化的教化和熏陶。从孩提时代到成人，人们从民俗文化中学得一系列知识、技能和道德，甚至是祖先留下的成见。”^②童谣作为民俗的一个组成部分，其教育作用似是毋庸置疑的。

童谣还是儿童文学的一种，而且或许是所有儿童文学体裁中最早出

① [美] 阿兰·邓迪斯（Alan Dundes）编，陈建斌、彭海斌译：《世界民俗学》，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389页。

② 钟敬文：《民俗学概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4页。

现的文学样式。儿童文学和儿童教育关系非同一般，现代儿童文学就是因儿童教育的需要才从大文学的母体里分离出来，并独立存在的。在中国，现代儿童文学诞生于“五四”时期。而在此之前，具备了适于儿童听讲成分的古代民间文学、古典文学及传统启蒙读物中的某些作品即具有儿童文学的性质，滋养着儿童们的精神生活。^① 传统童谣即是其中的一种。在文字出现之前，它或已在人类世界存在着，凭口耳相授一代代流传下来，是祖先教育、娱乐后代的重要形式之一。^②

在漫长的中国古代社会中，接受正规教育的人数十分有限，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平民百姓是被排除在学校教育之外的，家庭教育和社会教化充当了传播文化、养育人才的重要角色。^③ 童谣既是家庭教育的一种方式，又是社会教化的工具。从这一点来说，童谣在乡土中国产生的教育影响或许比我们想象的更为广泛而深远。

为了贴近鲜活生动的历史，对儿童教育情状有更为真切的了解。本书从日常生活的平凡细微处着眼，选取传统童谣为研究对象，在将童谣置于其“前后左右的时空环境”中考察的基础上，^④ 试图描摹出历史上儿童教育不为人知的一面，展现出生活中对儿童施教的实际过程，并据此透视中国传统的儿童观和儿童教育观。20 世纪 20 年代顾颉刚研究孟姜女故事时，时人曾讥之为“小题大做”。顾颉刚则认为，“无论什么

① 参见黄云生《儿童文学概论》，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21 页。

② 参见黄云生《儿童文学概论》，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49 页。

③ 参见杜成宪、王伦信《中国幼儿教育史》，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6 页。

④ 参见罗志田《见之于行事：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可能走向——兼及史料、理论与表述》，《近代中国史学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255 页。

小问题都会有极丰富的材料，一粒芥菜子的内涵可以同须弥山一样的复杂”。^①以童谣为切入点探究儿童教育历史正是自“芥菜子”一般的小材料中做文章。

三

作为民谣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童谣是人类学、民俗学以及文学等学科的基本论资和研究对象。所以本书在研究过程中也试图穿梭于多种学科之间，借鉴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

首先，吸取民俗学的研究方法。在民俗学兴起发展的一百多年间，民俗研究基本有两种学术趋向，即事象研究和生活整体研究。“所谓的事象研究是指那种专注于纯粹的、排除了过程的现象的研究取向，所谓的整体研究是指那种全面考虑活动的各个方面的研究取向。”^②事象研究面向文化和历史传统，倚重于对文献的收集和分析，对使用民俗的人（民俗主体）和民俗发生的情境基本悬而不论。整体研究则面向生活和社会现实，偏重于田野作业和对活动过程的理解，将民俗主体、发生情境和民俗事象看作一个整体来进行研究。由英国人类学派民俗学家开创的事象研究在民俗学史上曾经占据着主导地位，这也深刻影响了“五四”时期以来中国民俗学家的研究。20世纪7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

① 顾颉刚：《孟姜女故事研究——〈古史辨〉自序中删去之一部分》，钱小柏：《顾颉刚民俗学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55页。

② 高丙中：《民俗文化 with 民俗生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03页。

民俗学家开始反思这种偏于对历史传统进行挖掘而较为忽视现实生活的研究趋向，从而将目光渐渐转向当代，转向活生生的人的生活世界。钟敬文在论及这门学科对象的时间取向时甚至说：“从根本上说，民俗学是‘现在的’学问，而不是‘历史的’学问。”^①

对于本书而言，则可在民俗学的这两种学术趋向之间取一条中间的道路。本书的研究面向古代，最大的限制在于无法回到历史发生的现场，研究工作只能依赖对散落在旧籍中的童谣的钩沉搜集而展开。此正所谓“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②但在研究过程中，我们将尽量避免把童谣当作剥离了人与环境的文本而来分析的做法，努力贴近童谣传唱时的历史情境，且致力于关注传唱的主体——那隐没在童谣背后的一代又一代儿童。也就是在“深究前人遗‘言’之时”，“尽量再现立言者之‘人与骨’及其周围环境”。^③在这一方面，顾颉刚对孟姜女故事的研究可以说为本书提供了一个范例。

其次，借鉴美国人类学家雷德菲尔德（R. Redfield）提出的“大传统”（great tradition）与“小传统”（little tradition）之说。1956年，雷德菲尔德发表了《乡民社会与文化》（Peasant Society and Culture）一书，提出“大传统”与“小传统”这一组相对的概念，用以说明在较复杂的文明中存在的两个不同层次的文化传统。“所谓大传统是指一个社会里上层的士绅、知识分子所代表的文化，这多半是经由思想家、宗教家反省深思所产生的精英文化（refined culture）；而相对的，小传统

① 高丙中：《民俗文化·民俗生活·序言》，第4页。

② 司马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③ 罗志田：《近代中国史学十论·自序》，第14页。